

名家

吕继宏： 让更多的年轻人 喜欢民歌

□本报记者 李博



吕继宏随中国文联、中国音协“送欢乐下基层”到福建演出
张大勇 摄

“我一直在思考的是，怎样才能让你们这代年轻人喜欢民歌。”2013年深冬的一个下午，著名歌唱家吕继宏在福建省福州市体育馆的休息室里，表情认真地对记者说道。此刻的他并不像平日那样，穿着一身干练的戎装，而是穿着一件整洁的便服。53岁的吕继宏，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随中国文联、中国音协到基层演出了，但他习惯于在每次演出时观察观众们的细微表情，并借此判断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歌、不喜欢什么样的歌，发掘什么样的歌更能引起共鸣、什么样的歌感染力不够。“这就是近距离为观众演出的好处，喜欢还是不喜欢，一目了然。”吕继宏说。

与中老年观众相比，吕继宏更加关注年轻观众对自己歌曲的反应。“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，民族唱法受到的冲击非常大，民族歌曲的爱好者年龄普遍偏大，‘80后’、‘90后’大多喜欢在网络上听欧美、韩日以及港台的流行歌曲，这必须引起我们这些民歌从业者的深思。”吕继宏说，“民歌为什么缺少听众？关键问题并不出在唱法本身，而在于优秀的作品严重缺乏。流行歌曲这么多人喜欢，还是因为它能够与听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。如果民歌还是像过去那样，一开口就是‘祖国啊祖国’、‘母亲啊母亲’，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？”

吕继宏一直认为，主旋律歌曲并不意味着就要不食人间烟火、就要墨守成规。“没有感情、缺乏新意的歌曲不会有生命力。”近年来，王昆、雷佳等年轻一代民歌歌手已经开始在歌曲中融入流行音乐的元素，包括我最近录制的一些歌曲，在编配上也做了一些时尚化的尝试。”吕继宏说，“民歌要生存、要发展，必须得求新求变。”

其实吕继宏自己就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人。这个出生于甘肃天水的西北汉子，直到29岁时还在甘肃省歌舞团担任声乐演员。不知为什么，与大海相隔万里的他，偏偏就对湛蓝的海洋充满了向往。“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梦想能成为一名海军战士。说来也巧，我学唱的第一首歌曲，就是当年脍炙人口的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。”吕继宏回忆道。在一次演出中，吕继宏偶然结识了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著名歌唱家王昆，王昆觉得他声音条件非常好，就鼓励他到北京发展。是选择甘肃省歌舞团安稳平淡的工作，还是选择一切尚茫然未知的北京？经过一番考虑，吕继宏决定做出改变。

1989年，29岁的吕继宏如愿以偿地考入海政文工团，成为一名独唱演员，并拜入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门下。“我这么多年的海军梦，终于在而立之年实现了。”吕继宏说。在入伍之前，吕继宏就听说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一年到头都会忙个不停，所以早就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。而当他亲身体会到这种忙碌时，除了辛苦，感受到的更是欣慰与满足。“从进入海政文工团那天起，我就开始了到全国各地慰问演出的旅程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北至漠河，南至西沙、南沙群岛，哪里有部队，哪里就有我们这些文艺兵的足迹。”吕继宏说。

大海的浪漫，令许多人无比神往，

但大海的汹涌澎湃，也会让很多人吃不消。吕继宏记得自己初登舰船去西沙慰问演出时，心中除了兴奋就只剩下好奇，“阳光与海水的味道是那样的清新自然、那样的让人着迷。”但随着舰船的行进，吕继宏开始晕船，肚子里的翻江倒海让他再也无暇顾及海上美景。抵达西沙后，身体逐渐恢复的吕继宏又开始对蓝天、沙滩以及战士们身上洁白的水兵服发出感慨。“但住了两天以后，一切浪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——岛上饮用淡水受到严格控制，基本没有青菜吃，更别提水果。我甚至很难想象，战士们是怎样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的。”吕继宏回忆道。

只有亲身体会过战士们的艰苦，才会真正理解慰问演出的意义。“我发现自己的歌声，也许能够帮助战友们战胜那些难以言说的孤独与苦痛，于是，立即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加重了。”吕继宏说。一次去南沙群岛慰问演出时，吕继宏乘坐的小船遇到了巨大的风浪，浪一拍过来，小船瞬间就被抛上去十几米高，演出被迫取消。望着近在咫尺却到达不了的岛礁，吕继宏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战士们坚强的身影，于是一把抓起扩音话筒，调大音量，对着岛礁大声唱了起来……“几十个观众要认真演，几十个观众甚至几十个观众也要全心全意地演。我不是哪里人多才去哪里演，而是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演。”吕继宏表示。

对于吕继宏而言，每年多达数十次的下基层演出是一个锻炼的过程，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“每次演出结束后我都会思索，基层老百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歌。”吕继宏发现，一些演唱难度比较大的歌，虽然听起来十分过瘾，但不利于老百姓传唱。“从《再见了，大别山》到《咱老百姓》，我的歌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高音多、技巧多。”吕继宏表示，“我希望多演唱一些老百姓随口就能哼上几句的歌曲，于是就反复对词、曲作者说，音尽量写低一点儿，尽可能朗朗上口一点儿。易于传唱，对于民族歌曲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非常重要。”

2013年全国“两会”上郁钧剑与赵本山的“雅俗之辩”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热议，很多人都对民族歌曲的曲高和寡表示了担忧。在吕继宏眼中，民歌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，“只要坚持创新，民歌就永远不会过时。在当今这个时代，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，都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。中国有15亿人口，这其中农民有多少？工人有多少？知识分子有多少？都是非常庞大的数字。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，我要是20多岁，也会喜欢听流行歌曲——我们这一代是吃杂粮长大的，而‘80后’、‘90后’是喝牛奶、吃巧克力长大的。这不是矛盾，也不是冲突，只是各有所需。”吕继宏表示，“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权利，所以你不能强求所有人都愿意买票去剧院听歌剧，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二人转。这就像吃饭一样，有的人喜欢去酒店吃高档菜，有的人就是爱在路边摊吃小吃，无所谓谁高谁低，只不过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罢了。”

『生如高粱，死如烈酒』

专访舞剧《红高粱》总编导王舸、许锐

□本报记者 乔燕冰



舞剧《红高粱》中的出殡一景

创作谈

象。我们不想在舞蹈里或舞台上出现中国人和日本人打来打去，或像“抗日神剧”那种并不高明的方式，我们是通过意象等手段，留给观众更多空间，去感受当时在那样生存艰难的环境下中国人的一种反抗，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。

记者：此次创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？

王舸：困难特别多。首先是有非常成功的小说和电影在前面，而舞剧样式很窄，舞蹈操作手段也很局限。第二个问题是怎么与电影和小说不同，要从小说中把故事抽离出来转化成舞蹈形式，要很精炼简短，适于舞蹈表达，这其实很难做到。

但最难的问题，是高粱的问题，这看似很简单，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。如果是歌剧或话剧，可以在舞台上种一片高粱，舞剧怎么种高粱？如果我们把舞台上全部种上高粱，就没有舞蹈空间了。就算我们舞台上铺天盖地种上满满的高粱，也就那么大一地方，不会达到电影里一片汪洋的效果。我们和舞美商量不用写实手法，而是作为一种精神、一种空间来做。借用高密的一种剪纸艺术，把高粱做成一种参天大树般的感觉，本身蕴含了一种人的气质，体现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精神。人就是高粱，高粱就是人。

记者：创作中是否有克服当下舞剧创作中的问题？

王舸：我所克服的就是传统舞剧的样式，这种样式很难打破。比如通常的舞剧从头到尾需要的演员要多，是大戏的概念，一定是一个半小时，一定要有单人舞、双人舞、三人舞、群舞等很程式化的东西。怎么突破这种惯常的样式，比如假设我的创作没有双人舞，只有独舞，这种样式突破后别人是否能承认，它是不是舞剧？都是创作所面对的问题，所以这种突破是很难的。

记者：《红高粱》如何处理舞与

要让观众在我们的舞剧中获得和读小说看电影不一样的感受。所以一定要按舞蹈艺术自己的规律来做。比如舞剧中的人物、情节一定要简化，要抽取最精炼的人物，把他们的关系和情感的主要线索拎出来，因为必须靠情感线索以及情感铺垫，让舞剧中的人物舞蹈起来。

《红高粱》诠释的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态度。把作品放在生命的意识的角度，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的、摩登的时代才能有意义，才能让我们在灵魂上有一种对话。

高粱的问题，这看似很简单，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。后来我们不用写实手法，而是作为一种精神、一种空间来做。借用高密的一种剪纸艺术，把高粱做成一种参天大树般的感觉，本身蕴含了一种人的气质，体现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精神。

很多人都会拿《红高粱》与你之前的《徽班》相比较，你认为二者创作上最大的区别在哪儿？

王舸：《徽班》更写实，《徽班》的整个情节更多的是故事+故事+故事的叙事方式。《红高粱》好在很多人知道故事，因此在戏剧设置上《红高粱》更舞蹈化，但是在舞蹈里并非把戏剧人物的舞蹈和戏剧分开来做，而是舞蹈里含着戏剧关系。《徽班》就很难做到这一点，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故事，观众对剧情完全不知情，必须把剧情交待很清楚。



舞剧《红高粱》中祭酒的场景

另外这个题材有抗日情节，但实际上舞剧中并没有出现日本人形象，只是出现过一次日本人剪影形